

面向二十一世纪

中医药教育思想探析

主 编

高宝忠
杨天仁

民族出版社

前 言

教育思想是教育的灵魂,是人们对教育的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更是教育发展的源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就没有教育的持久健康发展。

纵观中医药教育发展轨迹,凡是教育思想明确,内容丰富的时期,中医药教育就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凡是教育思想陷入混乱、迷茫的时期,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因此,当我们即将迈入新世纪时,面对中医药教育思想研究几近空白的现状,更倍感进行“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医药教育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古代的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于漫长的传统文化发展时期,以《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方》等为代表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充分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观,道家辩证法思想和佛教慈悲观的合理内核和观念,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医学教育家根据当时的中医教育水平和成就,以智慧的语言及精辟的文字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观点,为中医教育思想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内容在近现代西医学和现代科技思潮的冲击下,已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开放性。

开展于四十年前的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在党和政府医药方针和教育方针的指引下,通过广大中医药教育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和不懈地探索,已基本形成规模。这其中,既有老一辈中医药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也有中青年的一代中医药教育工作者的大胆

尝试和实践,更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教育改革的严峻思考,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和江泽民关于提高两个效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医药教育工作者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挑战,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在中医药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探索中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本《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医药教育思想探析》小书的问世,正是对上述成果的一次总结。

当然,目前有关中医药教育思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定还会有更多更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抓住中医药教育思想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将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关教育思想的阐述与中医药教育的实践相结合,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需要,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书的编撰完成,来自于众多从事中医教育研究工作的同志及专家的集体努力,更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许多领导和学者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热心鼓励,这本书的问世是难以想象的。谨此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目 录

上卷 中医药教育思想的发展及成就

第一章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	(1)
第一节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教育思想	(1)
第二节 以葛洪、孙思邈为代表的中医教育思想	(20)
第三节 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中医教育思想	(47)
第四节 以杨继洲、徐大椿为代表的中医教育思想	(58)
第二章 近代中医教育思想	(78)
第一节 “西学东渐”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78)
第二节 受西医影响的近代中医药教育	(80)
第三节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探索	(81)
第四节 近代著名中医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100)
第三章 现代中医药教育思想	(106)
第一节 现代中医药教育思想的形成	(106)
第二节 现代中医药教育思想的特征及内容	(116)
第三节 面向改革的现代中医药教育思想	(124)
第四节 多样化的现代中医药教育思想	(128)

下卷 面向 21 世纪中医药教育思想研究

第一章 面向 21 世纪的中医药教育社会观·····	(138)
第一节 满足社会需求的中医药教育思想·····	(138)
第二节 适应社会潮流的中医药教育思想·····	(147)
第三节 追求社会效益的中医药教育观·····	(158)
第四节 融入社会文化的中医药教育思想·····	(175)
第二章 面向 21 世纪的中医药教育人才观·····	(179)
第一节 跨世纪中医药人才的培养目标·····	(179)
第二节 跨世纪中医药人才的知识结构·····	(196)
第三节 跨世纪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模式·····	(204)
第四节 跨世纪中医药人才成功的基本因素·····	(219)
第三章 面向 21 世纪的中医药教学观·····	(232)
第一节 面向 21 世纪的新旧教学观·····	(232)
第二节 面向 21 世纪的教学内容变革·····	(237)
第三节 面向 21 世纪的教学结构与管理·····	(246)
第四节 面向 21 世纪的教学形式与方法·····	(261)
第四章 面向 21 世纪的中医药素质教育观·····	(273)
第一节 面向 21 世纪的中医药素质教育内涵及必要性·····	(273)
第二节 面向 21 世纪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277)
第三节 面向 21 世纪的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281)
第四节 实施 21 世纪中医药素质教育的思路与途径·····	(286)

第一章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

导 读

教育思想是人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她来自于人们的教育实践，又经不断运用并反馈于教育实践中去，表现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理论。中国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正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医学的特殊背景和传统中生根，开花，结果的。本章指出：中国汉代以前《黄帝内经》确定的传统医学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教学过程及方法奠定了中医教育思想的根本基础，她与晋代葛洪不拘俗常、创新求真、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以及隋唐时孙思邈尊德重能，责生崇术的教育观念；金元四大家质疑创新、注重实践、穷尽医理的教育特色和明清时期溯本求源、分合同归、德才并重、思想与实践并举的观念一起构成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主流。它们至今仍对中医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 中医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其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关于教育之含义，《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可见，教育泛指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体而言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

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实施主要取决于这样几个要素,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手段,而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更是决定了教育的成败;教育目的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重性,其能否实现也取决于各学科自己的教育目标。所以我们认为研究中医教育思想,也必须从其教育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关系,教育目标等入手进行探讨。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不能不谈到《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第一部经典,开创了中医教育之先河,其教育思想的成就尤其丰富,特探讨如下:

一、《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教育要素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是构成教育过程的实体要素。四种要素按其作用的特点,可划分为能动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和非能动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教育内容对其所产生的教育目标起了特定性规定作用,因此,欲达到某专业教育目标必须有其相对应的教育内容,这是肯定的。但是教育过程的设计、运作以及教育目标的实现,则是由能动要素来完成的,所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选择及其之间的关系在教育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教育手段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一)《黄帝内经》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黄帝内经》在选择受教育者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云:“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灵枢·官能》云:“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素问·金匱真言论》曰:“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素问·气交变大论》更强调:“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漫泄天宝”。《黄帝内经》反复强调受教育者的选择,足见古代医家对此问题的重视,即遇到合适的人才,就要传授其适当的医学知识与技

术,而不能放过机会;而对于不适合做医生的人,就不能传授其医学科学,以免破坏医德、危害社会,有损于中医学的发展。认真、严格地选择学生,确实是教育是否成功的首要条件,现在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来进行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笔试、面试,从其道德修养、性格特点、知识面广博程度、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察,目的就要“得其人”,以使教育目的能够达到。

《内经》在强调严格挑选学生的基础上,还倡导因材施教。《灵枢·官能》说:“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者;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于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人之天赋不同,性情志趣各异,故传授学术要选择人才,分别传授不同的技术,其中视力好的人,即目光敏锐者,可使其学习辨别色泽;听觉敏锐者,可让其学习辨别声音,担任听诊;善于辞令、吐字清晰者,可担任咨询、讲座教学等工作;动作轻缓、神态安静、精神专注、手巧灵活、肯用心思钻研者,可让他学习针灸技术,以调整患者的气血,也可同时让他学习诊断技术、方药运用等;手势柔和、性情调顺之人,可学习导引气功,用运行气血的方法治病;嫉妒成性,口舌恶毒,言语轻薄之人,可以让他唾痈肿,咒病邪,即担任“祝由”工作;手指形态粗劣,下手重者,可使他学习按摩积聚、抑制痹痛。若此,则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即“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

现在看来,这种教育思想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它与孔子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尤其在我国教育史上,他的地位非常高,也是第一位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重视了解学生的个性,对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有比较深的

了解,如他指出,子路有治兵之才,冉求有做邑宰之才,公西华有外交之才。他曾概括地指出学生个性,如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等等。孔子在进行教育时,常按照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如同样问仁、问学、问孝,而他对每个学生的答复都是对症下药、不相雷同的,又如他的学生有的个性过于“退”(畏缩),他就用方法以“进之”(加以鼓励);有的过于“兼人”(轻率),他就用方法以“退之”(加以抑制)。兹举一例如下:《论语·先进》曰:“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求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正因为他重视因材施教,所以他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的成就也就不同:有的长于“德行”,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有的长于“言语”,如宰我、子贡;有的长于“政事”如冉有、季路;有的长于“文学”,如子路、子夏(《论语·先进》)。《内经》因材施教的思想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相似,如同出一辙,故可以认为《内经》发扬了孔子思想,并把之具体运用到中医学教育方面。这一思想十分先进,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能够快速、容易地实现教育目的之一即培养人才,按学生各自特点、兴趣引导其发展、掌握专业知识、牢固专业思想,极早成为人才;而且还能够较容易地实现教育目的的社会性,即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从多角度、多方位为发展中医学、为解除人类病痛、促进人类健康而服务。

就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言,《内经》也有明确的表述。一方面提倡尊师重教,黄帝贵为天子,但是他对岐伯这位教师是十分尊重的,有时还要“黜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素问·玉机真脏论》),而且要将岐伯的论述“著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当其听岐伯讲《素问·三部九候论》时则向他的老师表白自

己学习的诚意：“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虽然学生对老师是十分尊敬的，但对老师所讲授的知识并非一味盲从，对于自己未理解的问题则采取穷追不舍，一定要搞清问题的本质的态度，如《灵枢·经水》就有“黄帝曰：余闻之，快于耳，不解于心，愿卒闻之”的记载；《灵枢·大惑论》也有黄帝对岐伯的“上于清冷之台，中阶而顾，匍匐而前，则惑”解释的疑问，其曰：“余疑其然，余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这些均反映了学生对老师是尊重的，但对所学习的知识更加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这一点也是现代教育学所提倡的。而另一方面强调老师爱护、鼓励学生，如岐伯就对黄帝这位聪明、谦虚、好学的学生非常满意，常称赞他问得明察深刻、问得详悉，讲他“良马易御，圣人易语”。由此看来，师生关系很融洽。从教育过程来看，只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能动因素，因此，只有这两者配合有方，才能很好地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完成教育过程，达到教育目的。

从历史上看，大凡一位好的教师，他与学生的关系，总是平等的、密切的，是真诚团结的，孔子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史记》上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世家》）。在后世儒者看来，恐怕又要说子贡太不为“尊者讳”了，其实，倒正说明孔子师生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坦率。孔子对学生的表扬、慰问、批评、鼓励，《论语》上记载有许多例证，均说明了孔子与其学生之间的融洽关系，而这一点也正是孔子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其实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人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遗传、环境和教育。而其中起主导作用还是教育。因为教育

是在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直接影响下，所进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影响活动，而且它可以把遗传、环境的影响充分地利用起来和组织起来，使它向着教育目标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看到，教育的关键在于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选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内经》谈教育，亦非常重视这一点，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二）《黄帝内经》的教育内容

中医药传统教育最终要培养的人是医学专门人才，因此《黄帝内经》所阐述的教育内容以医学专业知识为主。

《黄帝内经》非常重视医学人才对医疗技术的掌握，对受教育者树立的成才标准很高，认为医生的服务对象是至贵之“人”，而医学“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素问·灵兰秘典论》），因此，要求学医者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上进心；对工作严肃认真的《素问·金匱真言论》之“非其人勿教”即是对其基本素质的选择，而《素问·移精变气论》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即要求医生在技术方面必须不断进取。《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等篇则对马虎从事、不学无术、学而不精之医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使学医者能疏远过失而具备完美医德与医风。如《素问·征四失论》云：“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此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失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三四失也”。

《内经》还主张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以“病为本，工为标”（《素问·汤液醪醴论》）为前提，以医生的医

疗技术和服务质量为基础,即医生必须顺从患者按病证而施以适当的诊治技术,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而另一方面,医生也必须取得患者的信任,即所谓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否则“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汤液醪醴论》)正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言:“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因此,《内经》要求医生对待患者要耐心周到、专心致志、心无旁务,“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静意视义,观适之变”(《素问·宝命全形论》),做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灵枢·本神》),才能与患者溶于一体,才能深入了解病情,以制服疾病。

由于受《黄帝内经》的影响,后世医家对《内经》所述医生素质也十分重视,并加以发扬,后汉张机批评的“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正是继承了《内经》观点;唐·孙思邈单立《大医精诚》一节,提出了完整的医疗规范;明·李中梓更是重视《内经》医德,他在《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中说:“尝读《内经》至《方盛衰论》,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尝不瞿然起,喟然叹轩岐之人人深也。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曷曷乎难之矣!”所谓不失人情,李氏认为有病人之情,傍人之情,医人之情,而医人之情最为关键。因为医人之情是言医生的医疗作用,是行医的规范和职业道德,所以“欲令学者思之慎之,勿为陋习所中耳”。李氏详述了医生之种种不良作风,如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辩相欺,或危言相恐,为“便佞之流”;接纳亲知,或营求上荐,或不邀自赴,此为“阿谀之流”;医术不精,诡言神授,假托秘传,此系“欺诈之流”;四诊不详审查,随便处方用药,此为“孟浪之流”;妒嫉成性,排挤同事,是非颠倒,为“谗妒之流”;贪得无知,妄投药剂,至于败坏,嫁谤自文,此为“贪幸之流”;诸医会诊,难以定论,对高明医者诊疗之见加以诽谤,此为“庸浅之流”。以上种种陋习,必须戒除,才能更好地诊治病人,才能成为高尚的医生。李氏这些论述,阐发了

《内经》旨义,成为医学生的必修内容之一。

(三)《黄帝内经》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

《内经》全书,多以问答形式写成,就实际问题来解析答疑,此为《内经》教育活动的基本方式,用这种方式教育学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 示人规矩的教学方法

《内经》强调医学教育必须给人以规矩,至于其重要性正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灵枢·逆顺肥瘦》说:“圣人为之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短而为方”。只有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学生才能学好,医学知识才能得到继承。

规矩,实则就是规律,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换言之,就是事物的共性,或一以贯十的本质属性。事物千变万化,但变中却有相对稳定的不变,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即规律,一以贯十,相对的以不变支配万变的东西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作为教育,欲增加学生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能力,其中欲使学生认识客观事物,实则就是让学生掌握客观事物中的规律,而人们抽象思维的逻辑能力说到底也正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在主观上的反映。因此,只有教学生掌握规律性知识,示人以规矩,才可能一以贯十,以不变通万变,从而把握客观事物,发展抽象思维能力。因此,就教育手段而言,《内经》十分重视示人以规矩这一点。

2. 重视基础知识学习,尤重授人以渔

《内经》教育手段,着重采取授人以渔,开发人的智慧,启发学生的思路,教以“真数”,强调学习者的思考和悟性,达到一通百晓,并认为学者能这样主动学习是“圣人易语,良马易御”。正如《素问·气穴论》引作为学生黄帝的话说:“余非圣人易语也,世言

真数开人意，今余所访问者真数，发蒙解惑”。《内经》并不满足于理性的启迪，还进一步要求“目见其处，耳闻其处”，达到运用于临床之目的，乃至采取直观形象化教学方法，使学生“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

在学习具体医学知识过程中，《内经》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如《素问·著至教论》就提出了“诵”、“解”、“别”、“明”、“彰”等几个步骤。这些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基本功训练。教学就其本质或主要内容而言，乃是教师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真理，创造条件转化为学生的真知，同时引导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认识过程。关键在于引导这两个“转化”。教学工作本质上是引导这两个“转化”的工作；施教之功，贵在引导，要在转化，妙在开窍。唐代韩愈在此基础上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果不把传授也理解为引导，“传”而不“受”的情况则是屡见不鲜的。孟子认为教学要做到“时雨化之”学以“自得”，强调“自得”和转化的道理。其实古今中外，说得肯定一点，根本没有单单教懂、教会的事，只有教学生学懂、学会，而且还必须教学生会学，才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从而越学越聪明。

为了便于进一步理解《黄帝内经》中的教育内容，我们可以从与《内经》同一时代的孔子教学思想中得到印证。孔子主张学与思相结合。《论语》中的“学”字，有广狭两种涵义，一般是指包括思与行在内的广义之“学”，如《学而》中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但《论语》有进也把学与思区别开来，即学指接受知识的狭义范围，如读书、学文等。所谓“学与思结合”就是指此“学”。孔子既重视学，又重视思，如《论语·为政》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学习时如果不积极思维，就会毫无所得；但是思维如果不以学习为基础，也

会流于空想,徒然使自己迷惑。因此,他对于那些不去追问事物原因的懒汉持批评态度,如《论语·卫灵公》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同时,他又云:“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表明他亦反对不学而空思。孔子认为,学习、教育的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学与思结合,他主张“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这一主张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甚深。不仅如此,在教的方面,孔子又提出启发思维的原则,《论语·述而》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心愤口悱”和“举一反三”是学生在一定基础上进行积极思维的表现,孔子认为教师应在学生达到这样境界时再加以启发,才能发挥启发的作用。这不仅注意了在学生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启发,并且要求学生在启发后进行积极思维,以求举一反三,否则教师就不要过多地启发,让学生去思考,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至于训练学生思维的方法,有“近思”、“叩两端”等多种。孔子的这些教育方法,《内经》中均有应用,尤其是“近思”和“叩两端”。《论语·子张》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故“切问”和“近思”也可以说是联系自己的思想、行为和知识水平的实际去思维,因而《素问·举痛论》则提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孔子在对人进行教导时,经常用问答或追问的方式,“叩两端”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方法,他教人注意事物的对立面,从事物的矛盾中去求得知识,其目的,是要启发问者的思考。而这一方面,《内经》多有运用。

3. 运用观察、归纳、总结、比较区分与类比等方法

《内经》托名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论理人形”,全书内容大多是运用观察法而得来的。举凡《灵枢·天年》之人以十年为阶段的生长发育过程;《素问·上古天真论》之男八女七的生殖发

育规律；五脏之体、窍、华的关系；某些疾病的外在表现等。莫不如此。

《内经》作者最善于运用归纳、类比的方法，把质料不同但性能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用“阴阳五行”理论加以归纳，形成了一个包括天、地、人在内的“四时五脏阴阳”系统，使学者能提纲挈领、便于掌握与运用。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推而次之，从其类序，分其部主，别其宗司，昭其气数，明其正化”，这样才能“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数”。《素问·天元纪大论》也说：“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这种方法的运用贯穿于《内经》全书，也是教育者教授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与手段。

《内经》还要求学生对不同学说进行比较区别，择善而从之。如脉诊的方法有全身脏腑经脉动脉诊断法、全身三部九候法、人迎寸口对比法、独取寸口法等；《素问·五脏别论》有关脑髓、肠胃属脏属腑的论述等，意在使学生在了解多种学术主张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各自主张的内涵与运用范围，以便正确运用与发展。而在教学中还采取比较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如平脉与病脉的比较，常色与病色的比较等。病机十九条是《内经》中的重要内容，但其涉及病证仅三十余条，有欠全面；缺燥气为病条文，有欠系统；叙述采用“诸……皆属于……”文例，语气偏绝对。实则，《内经》并非让学习者把之作为口诀在临证上对号入座，而是重在示范分析病机的原则与方法，晓之以如何具体运用观察、归纳总结、比较区分、类比等方法。

其一，该文运用藏象、经络等方面的知识，分析疾病的病因、病位与病变性质。五脏六气各有不同的特性，所致疾病亦各有不

同特征,利用这一原理即可推测病位和病性。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等,均为此类。

其二,区别病证的邪正虚实是贯穿十九条病机的纲领,也是辨别病机的关键,故原文说:“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

其三,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异同互证,重视鉴别诊断。不同病证,可能属于同一病机;相同病证,又可能是不同病机的反映,只有通过比较鉴别,区分证同证异,才能确认病机。如火热病机共九条,病证二十多种,但均具有火热邪气致病的特点;而同一抽搐、拘急病证,又有属风、热、寒等的不同。故提示临证时应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注意病证本身的不同特点,以资鉴别。

4. 由博返约的教学归纳方式

《内经》强调医学学生学习,首先应做到博,只有广泛学习、学识渊博,才能得到真实的本领,也才能使自己充实。其次,则应在“博”的基础上,提纲挈领加以总结归纳。即所谓“约”,这样才能掌握所学的真谛,才能精而不杂、出神入化、运用自如。《灵枢·禁服》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原文说:“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俱。雷公曰:愿为下材者,勿满而约之。黄帝曰:未滿而知约之,以为工,不可以为天下师”。明确地提出,学习必须“满而后约”、“由博返约”,否则,则不能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更不能成为天下之师表。

与此同时,孔子作为一个大教育家也提出了“由博返约”的思想方法,他主张从博学中去认识“一贯”之道。如他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他指出了学习中“博”与“约”的矛盾统一,要以博为基础,根据一定的原则去加以归纳,约简成精要的认识和知识,这是